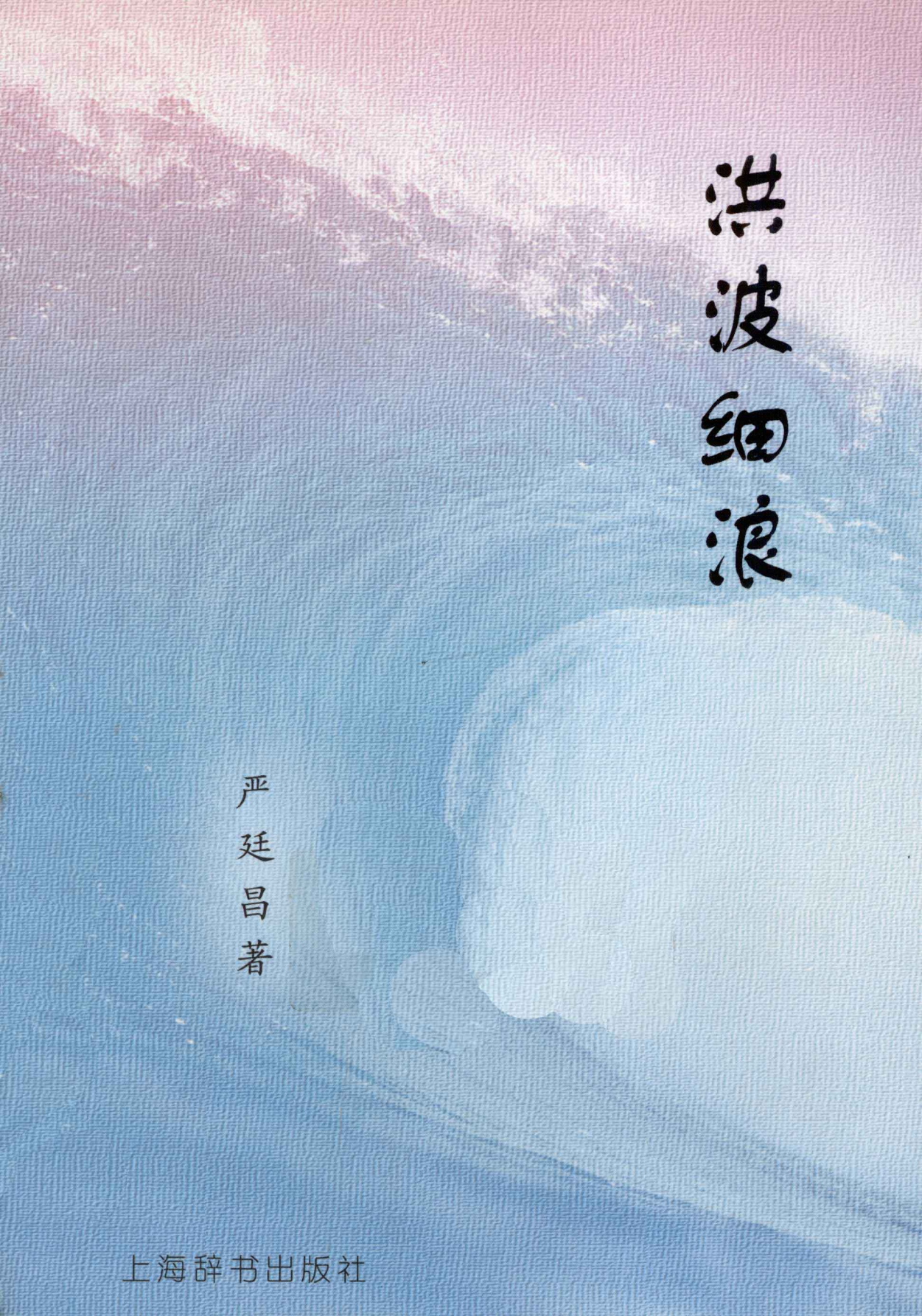




洪波细浪

严廷昌著

上海辞书出版社

洪波细浪

严廷昌
著

上海辞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洪波细浪/严廷昌著. —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10.9

ISBN 978-7-5326-3205-3

I. ①洪... II. ①严... III. ①严廷昌—自传 IV. ①K827=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179082 号

责任编辑 刘小明 徐思思
特约编辑 王祖光 唐振岳 余志勤 成 真
装帧设计 严小平

洪波细浪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发行
上 海 辞 书 出 版 社
(上海陕西北路 457 号 邮政编码 200040)
电话: 021—62472088

www.ewen.cc www.cishu.com.cn

上海书刊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720×1000 1/16 印张 16.75 插页 9 字数 265 000

2010 年 9 月第 1 版 2010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326-3205-3/K·740

定价: 28.00 元

如发生印刷、装订质量问题,读者可向工厂调换
联系电话: 021—36162648

序

廷昌同志是上海市旅游局第二任局长。我与他之间隔了两任(他之前有齐维礼,我之前有王乃粒、姚明宝),作为继任者,我对他们始终怀有深深的敬意。上海旅游业能有今天的局面,正是这样一棒一棒传承接力,一批一批忠于使命的同志持续创业、创新的结果。而从某种意义上说,廷昌同志那一任似乎更为艰苦。无论是对于宾馆短缺瓶颈之突破,对于国际先进管理理念之引进,还是对全市旅游体制之理顺,对人才培养选拔之重视,廷昌同志他们这一届都付出了很大心血,且具有开创性的价值。据此,世界旅游组织于1988年,专门为廷昌同志颁发了荣誉奖(时至今日,中国旅游界获此殊荣的仅为四位)。

多年来,我与廷昌同志相交甚密。读了他的这部新著,我知道了更多他多姿多彩的种种往事,也更真切地触摸到了他那情感丰厚的内心世界,平添了对他的敬意。透过字里行间,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在其长达20年之久的外事生涯中,他如何辗转于我国驻非洲的三个大使馆,在周恩来总理高尚人格感召下,由“学徒工”演变成一位颇有建树的外交官的;在担任上海市旅游局局长的五年间,他又是在何种艰难的情况下,一步步夯实基础,为全市旅游事业进入健康发展的快车道付出心血的。而附录中所记载的那些片段,同样让我们真切感受到,在全国解放前后那个时期,廷昌同志投身革命,以及从事新中国建设的诸多真实记载。

廷昌同志在长达半个多世纪的革命生涯里,经历过一次又一次的政治运动,遭遇过各种各样的风险,而他几乎每项工作都干得相当出色,每次凶险他都能化险为夷。这就不能不说在他身上具有那么一点传奇色彩了。尤其难能可贵的是,他始终保持不骄不谄、低调平和、不走极端的为人处世品格。书名中,他把自己明确地比为社会洪波中激起的一朵细小浪花。这位毕生尽心竭

力,为社会做出过不俗业绩的前辈,能有如此情怀和心志,的确很令人赞叹。相信阅读本书的读者,会从中获得应有的激励和启迪。

廷昌同志的《洪波细浪》一书首先行文自然流畅,细腻质朴,这很可能得益于他学生时期打下的文学功底。当年廷昌同志曾怀有“作家之梦”,但风云激荡的年代,却推着他走上了职业革命之路。然而几十年间他对文学的偏爱痴心不改,在职时,他所作的报告很少假手他人,还时常向报刊投稿。其二,情感真挚,不事雕琢修饰,喜怒哀乐坦然面呈。熟悉他的同志都知道,廷昌同志身上具有一股儒雅淡定的气质,为人处世既担得起,又放得下。然读罢本书,人们会发现他性格的另一面——在某种特定场合,他也会率性而起,口无遮拦。其三,也是最主要的,那就是有凭有据,真实可信。廷昌同志素有勤记日记的习惯。这些日记和资料从未散失,加之他思路清晰,记忆力又好,几十年前的陈年往事,时间、地点、人物,以及当时场景,均可一一复原再现,落笔时又反复斟酌,唯恐一事不真,一处不实。

所以廷昌同志这本书可信、可亲、可读。文如其人。

道书明

2010年5月

(作者为上海市旅游局党组书记、局长)

前 言

1992年，当我办完离休手续之后，就有同志向我建议：你的一生过得还算顺利，何不趁此闲暇，写一点回忆录之类的东西？当时我对他们的善意很不以为然。一则文字工作非我所长，虽然中学里参加过进步同学组织的读书会，后来又学过几天新闻专业，大学里又读过两年文科，一度怀有当作家、随军记者之梦。但我们这一代人，一生几乎由组织安排，信奉的是党叫干啥就干啥，学生时期一时冲动形成的那种所谓理想，早已成为难以企及的奢望。二则自己生性淡然，对明代洪应明《菜根谭》中的两句话相当欣赏，说是：“风来疏竹，风过而竹不留声；雁渡寒潭，雁去而潭不留影。”我想，我们这些普通人，说过去就过去了，没有什么值得回忆、值得去写的。于是，一拖就是十年。

然而时间毕竟能改变人。随着自己生活节奏越来越慢，空闲时间越来越多，原先那种想法不经意间也发生了某种变化。而且很有意思，这些变化又主要发生在我因病住院期间。

2002年春，因患腰椎间盘突出，我住进了医院，整天躺在病床上，面朝天花板，脑子里七想八想，思绪如麻。想着想着，突然想起了自己的童年生活，想起了少时离家到外地读书，父亲送我时的情景。他站在大门口，右手搭在额前，隔着一条河，看着我过了桥朝远处走去；我几次回头看时，年迈的父亲极目远送我的身影，仍旧伫立在原处不动，一直到看不见为止。想到这里，我的双眼湿润了……想着想着，又想起我早年投身革命时，与我并肩战斗的许多同学、战友……诸多陈年往事如同电影镜头一幕幕清晰地泛上了我的心头。我此时想到：把这些往事写下来，让子女们看看也好——这就是我着手动笔的初衷，想法也很单纯，为子女们而写，想为他们留下点什么。

2003年夏，当我把前面几章的草稿交给孩子们看时，他们都非常感兴趣，

说：“这些事我们以前都不知道，希望您能坚持写下去，我们要留着好好看看。”这样，我便在随后的日子里，凭借个人记忆所及和历年积累起来的日记资料，边想边写，边写边改。按照时间先后顺序，断断续续地坚持了四载，写了四十余万字，总算是了却了一桩心愿。

2009年8月，每年一次的体检查出了我胃部患有疾病，我再次住进了医院。其时，我的那部家庭版回忆录已经完成，我当年的一些老战友和同事看后亦给予不少肯定和鼓励。几位热心的朋友更是鼓动我将此改编成书，争取出版。为促使我及时动笔，他们还从全书的立意和主体结构上提出了许多好的意见，并要我以今日之眼光对往年的种种主要经历再作一番全面审视。

面对热心友人的勉励，说句实在话，我心存感激，但又踌躇再三。因为此类书籍已多之又多，我等凡人琐事很难引起社会读者的关注和兴趣。（即使如今，我的感觉亦是如此。）但“再作一番全面审视”的那些话，倒是很能打动我的。记得古希腊哲学家苏格拉底就曾说过：“未经省察的人生没有价值。”我感到，人生就像一个不停旋转的大舞台，每个人都会在这个舞台上，自觉不自觉地扮演着某种角色。说到底，人生的走向和命运的把握，主要还在自己；人生又像是一本大书，当快要翻到最后一页的时候，掩卷沉思，对此生的是非得失、功过成败，进行一次集中性的自省与审视，对自己很有必要，对家人及其他人而言，也可作为某种参考。如此这般，我便不揣浅陋地在病房里，以我的外事生涯及旅游事业为主体，对原有书稿作了大幅度的压缩调整、补充修改，再承蒙好友唐振岳和《旅游时报》总编辑王祖光鼎力相助，才有了这本名为《洪波细浪》的新书。

以上这些，便是我写作期间真切的心路历程。今日坦然相陈，想必读者诸君是会理解的。倘若能对拙著予以浏览，认为还可以看看，我就备感欣慰了。

最后，想就书名再说上几句。洪波者，社会之大变迁，时代之大潮也；细浪者，个人之作为，众生之位置也。我以“洪波细浪”作为书名，既是出于对此生所处社会大变革的歌颂，也是出于对自己个人作用的如实审察。回首往事，我是相当幸运的，赶上了中华民族历史上最为可歌可泣、最为伟大的年代，可谓身逢其时。赶上这波澜壮阔、奔腾不息的社会发展洪流，个人作为大海中一朵细小浪花，尽一点微薄之力，同样值得我万分庆幸。

同时，还要说明一点，书名中“洪波”两字的意境，乃得自中国历史上两位

伟大诗人的启示。一位是 1800 多年前的政治家、大军事家、建安文学大诗人曹操，他在大胜乌桓之后，豪情满怀地来到北戴河附近的碣石海边，写下了雄伟的《观沧海》诗篇：“东临碣石，以观沧海。……秋风萧瑟，洪波涌起。……”而另一位，同样是大政治家、大军事家、大诗人、新中国的缔造者毛泽东于 1954 年，也来到曹操到过的地方，写下了著名的《浪淘沙·北戴河》瑰丽篇章。词中写道：“大雨落幽燕，白浪滔天……往事越千年，魏武挥鞭，东临碣石有遗篇，萧瑟秋风今又是，换了人间。”这两位诗人相隔千余年，在同一地方不期而遇，一句“洪波涌起”，一句“白浪滔天”，所表露出的那种对历史沧桑特有的恢宏气度和豪放，是很令人为之震撼的。

再次感谢编辑同志热忱相助，并盼诸位读者不吝指教。

严廷昌

2010 年 5 月上海世博会隆重揭幕之际
于华东医院

目 录

序 前言

第一章 外事生涯

- 马里共和国(1960.1—1965.10)/1
- “文革”五载(1965.10—1970.8)/37
- 阿尔及利亚(1970.9—1977.10)/55
- 埃及(1978.10—1981.1)/90
- 难以忘怀的人和事/115
- 外事工作的几点结语/124

第二章 旅游事业

- 回到 34 年前的办公室/127
- 上海旅游业难忘的 1983 年/129
- 把前景希望建立在奋斗基础之上/131
- 干部年轻化和新老交替/136
- 下放外联权/138
- 快速培养和造就饭店管理人才/140
- 引进喜来登管理华亭宾馆/144
- 上海旅游业的特色何在/146
- 上海旅游发展战略研讨会/149
- 政企分开/151

要人要事略记/157
打扫房间迎新局长/163

附录一 往事钩沉

追求革命参加党/167
从事学生运动/176
秘密交通杂记/188
工会工作片段/202
我的父亲和母亲/224

附录二 报载短篇

一进一出之间/236
家有两扇窗/237
冷暖自知/238
蜈蚣与大胡子/239
大提琴和小提琴/240
喜欢读地图/241
面包·理想·平凡/242
不接受挑动/244
有容乃大/245
想起了维克斯/246
旅游是心灵的感应/247
从珍珠港到长崎/249
一张珍贵的老照片/251
文化是发展旅游业的灵魂/254
带不走/257

第一章 外事生涯

1959年,是我人生历程发生重大转折的一年。此前,我作为上海地下党的一员,迎来了新中国的诞生,并抱着“向工人阶级学习”的意愿,在上海市总工会机关及其所属部门整整工作了十年。1959年下半年,我奉调至即将落成的市总工会沪东工人文化宫担任主任。之后,因为工会体制隶属关系的变更,我的行政和工资关系从市内转至杨浦区,被任命为区委宣传部副部长。就在这一年的最后一天,我突然接到通知,调我到中央外事部门工作。自此之后,先马里,后阿尔及利亚,再埃及……历时长达二十个春秋,展开了我此生一幅新的主页。

马里共和国(1960.1—1965.10)

奉调中央外事部门

1959年12月31日,对我个人来说是个值得纪念的日子。上午9时,我按通知准时到达市委组织部干部处,处长卓超原同是当年的地下党员,我是熟悉的。卓处长非常客气地说:“中央负责对外联络工作部门的一位同志找你谈话,在隔壁房内等你。”我进去见到一位40岁左右的男子,穿一身整齐的毛料中山服,仪表庄重地坐在那里,见我进来,站起来和我握手,略事寒暄便切入正题。他说,根据工作需要,拟调我到中央对外联络部门,有机会还要出国工作,问我有什么意见。当时我听了首先感到突然,接着一想,从内心讲是愿意的,尤其有机会出国工作是我所向往的。但我的表态仍然是传统的、平静的:“我没有什么意见,服从组织决定。”他没有再多说什么,谈话就结束了。

时隔一个星期,也就是1960年的1月8日,市委组织部再次通知我去谈

话，还是那间房，还是那位从北京来的同志。他正式告诉我，组织上已决定调我去中央部门工作，并询问我的家庭情况，尤其对配偶问得较为详细，如工作单位、是否是党员、行政级别等等，最后说：“你们夫妻和家属一起调北京。现在任务较急，希望在十天到两个星期内，你们夫妻二人先到北京报到，然后视情况再回上海接孩子。”后来我得知，找我谈话的那位同志，是中央某部干部局的一位处长，叫侯德华，解放前曾在上海从事过地下党情报部门的秘密电台工作，亦算是我当年同一战线上的战友。

在去北京之前，我一直不知道要去的单位叫什么名称。临行前，市委组织部卓处长交给我一只牛皮纸信封，信封上用毛笔端端正正写了“中共中央调查部”几个字。我看了一愣，这是个什么单位？事前侯处长一直说是中央对外联络部门，我以为去的单位是“中央联络部”。为便于我们到北京后的接站，侯处长为我们作了妥善安排：“你们到北京后，就在火车站底楼候车大厅东北角等着，会有人接你们。”并商定由我爱人凌秋芷肩上披一条粉红色的围巾，同时给我们一个电话号码备用。

1月21日清晨，火车准点到达北京站，我们按约定等在指定位置，果然不出十分钟，一位女同志前来问了我们的姓名，非常友好地说：“我们走吧。”她还笑着对秋芷说：“我很远就看到你的红披肩，真漂亮。”接着我们跟着她上了一辆小汽车。这种接站方式，让我回忆起当年地下工作秘密接头的情景，暗自觉得好笑。汽车出了西直门继续行驶，不太长的时间就到了一个机关，大门口有两位解放军战士站岗，那就是当年中共中央调查部的所在地。对这个单位的初步印象是占地面积很大，院子就像一个大花园，大门朝东，中央一条大道，两旁大树成排，东部为生活区，西部为工作区，中间用一道围墙隔开，中间的一道门也有两名战士站岗。进出工作区都必须出示工作证，非工作人员不得进入，保密保卫制度非常严格。

我们被安排在招待所住下后，大约花了四五天时间安排生活和熟悉环境，接着便接受短期业务训练班培训。短训班分甲、乙两班，甲班三十三人，都是从全国十几个省市调来的，有的省市只调一人，有的如江苏、广东、山西等各调两人，上海调得最多，为五人。其中四人比我早来北京。甲班学员的配偶多数分在乙班。甲班分三个组，我分在第三组。组内有山西、江苏、浙江、河南等省来的同志。

第一天去班上报到时有个小插曲，甲班三组一位从山西来的女同志从窗口看到我们两人慢慢走来，对组内的同志说：“你们看啊，上海来了一对年轻的电影演员。”当时我和秋芷在班里的年纪算是较轻的，如果电影演员只要求年轻漂亮的话，那秋芷是够条件的。这里还有一个小故事，进京前几年秋芷在上海的文化广场看捷克军队歌舞团演出，捷克摄影师对着她拍了几个特写镜头，后来在捷克领事馆赠送的一期画报上，就以秋芷观看捷克军队歌舞团演出时的大幅照片作为封面。后来还有一件凑巧的事，一天在大礼堂看电影，正片之前放了《捷克军队歌舞团访华》的短片，片中突然出现观众席中秋芷的大幅特写镜头，坐在我身旁的英语班学员老施一下子叫出声来：“啊！这不是凌秋芷吗？”

甲班和乙班各自成立了党支部，甲班的支部书记是江西省委组织部原副部长老彭，年龄50岁左右，是一位老成持重的长者。班主任由干部局一位处长兼任，他平时工作很忙，很少到班里来。甲班的学员来自四面八方，人才济济。我们组内就有山西省的团委书记、大同市的银行行长、江苏的一位“县太爷”，上海来的周绍铮同志原来是闸北区区长。

这里的学习生活非常宽松自由，学习的方式是听报告、看文件和小组讨论。报到后一星期正好赶上听伍修权《关于南斯拉夫情况》的报告，那时部长李克农因病住院，由代部长孔原主持会议。会场在部长楼二楼大会议室内，除了甲班三十几位学员外，在职的处级以上干部二十余人也参加了旁听。第一次参加这样的报告会，我内心感到很兴奋。伍修权曾任驻南斯拉夫大使，谈起来如数家珍。孔原不时插话，气氛非常轻松活泼。之后的报告，是请曾在东南亚担任过好多年高级外交官的一位局长来作。他讲“民族主义国家介绍”，隔几天讲一次，共讲了三次，系统介绍了相关国家的情况，包括执政党和在野党，如何同所在国的政界做好工作的体会，等等。

我第一次听伍修权报告那天，看到会议室墙上挂了一个很大的镜框，上面是毛泽东亲笔书写的“知己知彼，百战百胜”八个大字。我想这八个字就是这里工作的最高宗旨了。要“百战百胜”就得“知己知彼”，如何“知彼”就需要调查研究。中央调查部以“调查”命名，是由党领导下的情报工作的性质所决定的，也是与中共中央在建党20周年之际发出《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以加强调查研究，实现情报工作由搜集警报性和保卫性的情报向搜集军政战略性情

报的转折所分不开的。纵观当今世界各国,没有一个国家不做情报工作,这是公开的秘密。中国作为大国,当然应随时掌握国际形势的动向。调查部这个机构在上世纪80年代初几经改组,如今已不存在,成为了历史。然而作为新中国一个时期以来情报工作的具体组织者和实施者,在事关党和国家安全利益等重大问题上,成为党中央工作的重要参谋与助手。

我在短训班只学习了三个月。对这项工作还不能说是入门,但我意识到这项工作的重要性和艰巨性。不知什么原因,我喜欢这项工作,并认为自己很适合做这项工作。1960年4月中旬短训班结束,甲班举行了简朴的结业典礼,代部长孔原讲了话。一开始他说:“短训班结束并不意味着学习的结束,而是一个新的学习开始。”接下去说道:“我们的调查工作,绝对不同于美国的CIA和苏联的KGB,我们有自己的特点,我们是在党的领导下工作,是讲原则的。他们是只讲目的,不择手段;我们既讲目的,也讲手段。我们不搞绑架、暗杀、美人计。”讲到这里他狡黠地扫了一眼在座的几位女同志说:“你们放心,我们不会叫你们去搞美人计的。”“我们的干部是经过严格挑选的,是好人里面挑好人,不是随便什么人都可以做这项工作的。为这样的事业献身是值得的。怎样献身?就是要为调查事业奋战到底!什么底?‘棺材底’!调查部的干部,就是要竖的进来、横的出去。李克农部长过去也讲过这种类似的话,他讲只有三种情况可以不做调查工作:一、组织上因工作需要调动;二、犯了重大错误;三、死了。在这条战线上的干部,就是要‘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听了孔原的讲话,大家都感到很受激励,很受鼓舞。散会后,甲班的同志有一个深深的遗憾,就是没能见到李克农部长,此时李部长正因病住院。老同志告诉我们,如果李部长不是因病重无法出院,肯定会接见你们,并同你们讲讲话的。可惜这位几十年来为党的情报事业作出重大贡献的李克农同志,于1962年2月9日不幸逝世。

业务训练班结束后,一部分同志分配了工作,留下一部分同志参加外语短训班学习英语。英语共分高、中、初三个班。我对英语有一定基础,经笔试口试参加了高级班。高级班开设两门课程,一为阅读,一为会话。老师都是一流水平,教会话的老师是从美国回来的一位50岁左右的女同志,她的英语发音非常准确也非常好听。有几门课是专门向外国人介绍中国菜肴的会话,什么

“芙蓉鸡片”、“鱼香肉丝”、“翡翠豆腐”，听起来怪馋人的。在三年困难时期上这样的课，同学们开玩笑说是精神会餐。

在七个多月的英语短训班里，我们除了学习和参加劳动外，还组织参观活动，生活是多姿多彩的。每隔一个月左右，班部就组织一次在北京市范围内的参观。先后去了发现“北京人”头盖骨的周口店、原子能反应堆所在地、人民大会堂、钓鱼台国宾馆、英国驻华大使馆旧址等等。参观人民大会堂时，接待单位破例招待我们吃了几样点心。在那困难年代，“糯米炸糕”、“萝卜丝饼”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参观长安街上的英国驻华大使馆旧址，让我们见识了这个老牌帝国主义国家大使馆内部过去不为人知的种种保卫和保密设施。在这段时间里，秋芷也由组织安排，只身一人回上海等地奔走了几天，把三个孩子和所请的保姆一起接到北京。孩子随后安排进入了部里专门为出国人员的子女设置的“少年之家”，缓解了我们出国投入外事工作的后顾之忧。

出国前的准备

1961年1月中旬的一天，干部局通知我下午去一次。事前我有一点预感，两周前，班上从上海调来的周效良同志，已被通知去斯里兰卡工作，这次会不会轮到我呢？接待我的是王蕴华副处长。果然不出所料，略事寒暄之后，王处长说：“部里想让你去马里工作，中马刚刚建交，大使还没有赴任，他主动向我们要人，现在想听听你的意见。”我对马里脑子里没有太多印象。这是一个西非内陆国家，原为法国殖民地，1960年9月22日脱离法兰西共同体宣布独立，同年10月25日同我国建交。我对这个国家实在太生疏，一时说不出什么。王处长看我有点犹豫，和蔼地说：“有什么想法说嘛。”我说：“马里的官方语言是法语，我学的是英语，在语言上可能会有障碍。”王处长笑笑说：“这点我们也知道，赖亚力大使说了，不会可以在工作中学嘛。包括外交工作不熟悉，他可以教你。”王处长还加了一句：“大使欢迎你去嘛！”这后面几句话打动了我。看来我的情况他事先已和大使研究过。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不能再说什么，就愉快地接受了任务。王处长最后说：“你和凌秋芷一起出国，隔几天大使来谈工作，你们一起参加。”

新中国成立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我国实行封锁政策，与我国建交

的只有二十几个国家,除了苏联以及东欧的国家,亚洲的朝鲜、越南、蒙古等社会主义国家外,便是印度、缅甸、印度尼西亚、巴基斯坦、斯里兰卡以及欧洲的瑞士、瑞典、丹麦等国。偌大一个非洲和我国建交的只有六个国家,即北非的埃及、阿尔及利亚、摩洛哥,西非的几内亚、加纳、马里。马里在独立后一个月即宣布与我国建交,是难能可贵的。在上世纪60年代初出国工作的机会不多,这是组织上对我们的信任,因此没有理由不心情愉快地接受任务。

这次谈话之后,我们即着手做出国前的准备工作。首先去外交部人事司报到,人事司同志提醒要抓紧时间制装,我和秋芷每人600元,因需路过寒带(莫斯科)每人另加100元,两人的制装费共1400元。这在当时是个不小的数字。从财务处领好钱,再马上到外交部供应处开介绍信。当时正处于三年困难时期,物资极度匮乏,办什么事、买什么东西都得凭介绍信。制装时去了红都服装店,这是北京唯一一家为高级干部和出国人员制装的专业店,业务非常繁忙,几位技术水平较高的老师傅还是从上海调来的。我需要做一套深色中山装礼服和两套西装,秋芷也要做一套深色礼服和四五件旗袍。衣服做成需要一个多月,最烦人的是中间还要试装。接下来到友谊商店供应出国人员所需专柜购买各种物品,供应处的物品是限量供应的,待到我们把衬衫、汗衫、短裤、皮鞋、拖鞋、衣箱,甚至毛巾、牙膏、洗衣粉都买齐了,制装费也花得差不多了。

出国的物质准备在今天早已不成为问题了,可是在四五十年前的困难时期,办起来真是累人。不过更重要的还是思想上、业务上以及语言上的准备。马里是新独立国家,又刚同我国建交,我们对它知之甚少,又没有现成的书面材料可供参考。这时正好有一位新华社驻外记者王殊(后曾任驻联邦德国大使)刚从西非回国休假,他在马里待过一段时间。经组织介绍,我赶到他下榻的北京饭店,他非常热情地将他所了解的有关马里的社会、政界情况以及自然风光、风土人情等,和我谈了一个多小时。这是我对马里的初步了解。

至于法语,我可是一窍不通,组织上对此也很关心,特地请了从法国回来的一位老师。据说这位老师的发音是标准巴黎音,他教得非常认真,练习发音时,要我们带一面镜子看自己的口型。后来每当在电视里看到法国总统希拉克讲话时龇牙咧嘴的样子,我就会想起这位老师教法语发音的情景。在行前一个多月的时间里,法语课只上了五六次就结束了。

与死神擦肩而过

2月下旬,中国驻马里大使赖亚力来部访问,常务副部长邹大鹏出面接待,主管西亚非洲事务的局长、处长们出席作陪,我和秋芷奉命参加。赖大使曾先后在我国驻苏联、瑞士大使馆工作,解放前党曾派他担任冯玉祥的秘书。后来他和我们谈起1948年冯玉祥访问美国、苏联时的一些事。那时赖亚力全程陪同,原计划冯访苏后回国参加新政协会议,不幸9月1日在黑海因轮船失火遇难。赖说,当轮船起火时,舱门被大火吞没,乘客纷纷从船舱两侧窗口逃生,冯身材魁梧腰身粗壮,怎么拉也拉不出来,结果被活活烧死。这件事后来在“文化大革命”中成了赖亚力的“历史问题”,造反派责问他:“冯玉祥死了,你为什么没有死!”

赖亚力以前也曾做调查工作,和部里的同志很熟悉,会见气氛很轻松。会后,赖大使专门和我谈了话,交代了一些问题。他说:“由刘长胜率领的中非友好代表团已启程赴非洲访问,他要在3月中旬赶到巴马科(马里首都)接待代表团。”我说:“十年前我在上海总工会曾做过刘长胜的秘书,如能和大使同行参加接待该多好。”他说:“你们准备工作还没有做好,现在来不及了,但仍需抓紧时间。出发可先乘火车到莫斯科,然后飞布拉格,再乘捷航每周一次的布拉格—巴马科班机到马里。”赖大使说:“大使馆新建工作很多,希望你们到使馆不要迟于3月底,早一天到任,可早一点开展工作。”他还交代:“你们马上和外交部驻马里使馆筹建处联系,请他们为你们安排好旅程事宜。”通过第一次见面,看得出这位大使对工作积极,有一股干劲,作风平易朴实,对同志也很诚恳。

在和大使谈话后的第二天下午,我即去外交部驻马里大使馆筹建处商讨去马里的具体行程问题。筹建处同志告知,此事大使已电告他们,已按照3月底以前到达马里倒计时安排,正在预订火车票、飞机票,并通知沿途使馆接送事宜。此时我们的准备工作也基本完成,只等筹建处通知最后领取护照、车票,于3月中旬启程了。

没想到,就在这一切安排妥当的几天之后,正巧碰到我部主管非洲处的处长李华农。李处长出差回京一上班就找我谈话,了解出发前的准备工作。我详细地向他作了汇报,包括行程安排和出发时间。他问我:“你们几人同行?”